

中国故事，国际讲述 之一

纪录片时代写真的国际化之路

□ 夏丽丽

Z 星期话题

长期在收视率的压力下被排挤到边缘地位的纪录片人，似乎嗅到了春天的味道。

我们显然对纪录片的发展寄托着更多的梦想，除了市场回报，还有文化负载和国际影响力。

1985年，美国马里兰州一位名叫约翰·亨瑞德的年轻人不满足于电视台只在有限的时间播放自己钟爱的科技纪录片，突发奇想要创办一个频道，全天候播放科教、自然、历史人文类节目，并为其命名为Discovery。20多年后，这个当初不被看好的频道成长为探索传播公司，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用户近4亿，年收入达到35亿美元。

如今，亨瑞德的梦想正成为中国纪录片产业的梦想，这与国内最近几年电视台纪录片制作环境的变化有关。2011年1月，中央电视台成立国家级专业纪录片频道，开播后效果不俗。考虑到此前国家出台了《关于纪录片发展的若干意见》，把纪录片的发展纳入文化产业的规划之下。长期在收视率的压力下被排挤到边缘地位的纪录片人，似乎嗅到了春天的味道，甚至有人直接欢呼纪录片的春天到了。第二年，《舌尖上的中国》热播，更让纪录片伴随着美食成为年度热点话题。

我们显然对纪录片的发展寄托着更多的梦想，除了市场回报，还有文化负载和国际影响力。然而，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中，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当我们涉及这些问题时，需要谈论什么呢？

□ 离国际化有多远

《舌尖上的中国》热播时，观众集体的反映是“很像BBC的纪录片”，这是一句褒奖。制作者们也承认，创作伊始，他们就有意以BBC制作的纪录片作为模板，尽量学习他们的表达技巧、创作理念。成片的效果不错，除了国内收视率一度超过当时最火热的电视剧外，与国际无

隔阂的表达方式，也让它成为近年来海外销售成绩最好的纪录片。

走向国际，如今是国产纪录片讨论的另一个焦点话题。央视纪录片频道为自己确立了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国际表达、本土价值的发展理念，致力于通过纪录片拓展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为此，一些创作者反复思考如何在创作理念和方法上缩减国产纪录片与国际的差距。

我们的纪录片离国际化有多远？在纪录片导演徐童看来，单从独立制作方面来说，我们的创作手法和理念并不逊色，这从中国导演和作品在众多国际纪录片节上频繁出现的身影就可以知道。在电视台纪录片创作相对滞缓的10余年里，民间纪录片的创作却异常活跃。在全球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上，中国导演的作品都曾获得大奖。徐童导演的作品就多次入选鹿特丹电影节、首尔电影节等。如果说国际电影节的参与程度是国际化的衡量标准，中国的纪录片远比中国的故事片走得更远。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纪录片一直站在国际化的舞台上。

□ 小众市场的迷思

市场首先是与受众有关的。这些年，一方面是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处于低迷阶段；另一方面，网络上关于纪录片的讨论小组、视频分享却长期保持活跃。在收视率决定一切的时代，除了少数几家媒体如上海纪实频道、金鹰纪实频道等在坚持，大多数都匆忙选择了看起来更能吸引大众的娱乐综艺、电视剧，很少有媒体再肯花精力、财力制作高质量的纪录片。央视纪录片频道及其作品的成功，除了让我们看

到纪录片的市场潜力，更像是一种提醒：观众一直都在那里，不是观众抛弃了纪录片，而是媒体抛弃了观众。当下对纪录片的热情，只不过是公众长期被忽视的文化需求找到了一个出口。

当年创办Discovery时，亨瑞德描述的理想受众是：教育程度硕士以上、有稳定而富裕的家庭收入、对外界充满好奇心。这样的定位，即使是在平均教育程度较高的美国，面对的也是小众化的市场。事实上，现在的探索传播公司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来自电子商务，剩下还包括衍生产品的获利，而其核心节目的播出之所以能够拥有庞大的受众，皆归功于其全球覆盖保证下的利基市场（指市场中通常为大企业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

市场相对狭窄，是全球的纪录片人都面临的问题。仅从收益的角度比较，一般的纪录片是无法和娱乐节目相提并论的。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雅欣看来，两者的衡量标准本应该是不同的。国产纪录片制作、发行的整体环境尚不成熟，忽略纪录片的创作特征属性，盲目乐观地重视收视率，反倒可能限制纪录片的创作空间，破坏创作的多元性。

□ 渠道更需支持

就纪录片播出发行平台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来看，从事纯粹的商业化运作的主要还是公司，探索频道、国家地理就是这类代表。像BBC、NHK这样不断有大量优秀纪录片问世的电视台，都是出自于公共广播电视体制背景，并没有完全被推向市场。欧洲颇有影响力的Arte艺术电视台，依靠的则是法德两个国家的支持。这

些电视台除了自制节目，也会有意识购买独立制作人的作品。

国外纪录片的播放渠道也更多元，除了电视台，还有音像市场、电影院和非剧院系统的社区等。有些国家对纪录片创作还有资金和政策上的倾斜。例如，加拿大针对纪录片项目有退税优惠，最高可拿到一半的退税保障；德国电影院纪录片放映能保有可观的份额，得益于政府的支持。而国内能够在电影院播放的纪录片屈指可数，靠票房盈利几乎不可能。独立制作人多处于单打独斗状态，缺乏资金来源、播出平台受限。正像一位纪录片人所抱怨的：没有来自政府、社会或个人基金会的支持，没有电视台的预卖，没有真正意义的专业制片人和制片人体系……，想从这样的状态迅速转变为国际上那种成熟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台湾纪录片市场从不完善走向成熟的经验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思路。在商业化的电视体制下，他们建立了公共电视台，提供纪录片的播放平台。同时，地方、电视台和一些基金会也会在资金上给予独立制作人创作支持，保证创作的多元性，培养纪录片人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慢慢有更多的资金愿意注入到纪录片创作中来。类似《他们在岛屿写作》这样的高质量的纪录片，除了获得“金马奖”，透过院线也可获得不错的票房收入。

张雅欣教授几十年来一直专注于纪录片研究。看着国内纪录片的沉沉浮浮，她认为，从国家文化安全角度考虑，把纪录片推向国际市场是必要的。但她更确定的是，中国的纪录片需要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狂飙突进不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在挖掘市场潜力和扩大文化影响力进程中，有纪录片创作人才的培养、播出平台的拓展、政府和基金会资金的支持等相互配合，国产纪录片才会真正走进春天。

博物馆之旅

字典，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手边书。但是，你知道古代人所用的字典是什么样吗？古往今来又有多少种字典呢？想知道答案，就请随我到“中华字典博物馆”走一遭吧。

从山西省晋城市驱车向阳城县进发，进入北留镇，来到皇城村，登上皇城相府最高点，便来到了中华字典博物馆。如此一个国字号的博物馆，怎会落户一个小山村？原来，这里正是康熙老师陈廷敬的故居所在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中，他曾任过“五部尚书”，然而，要说到他最伟大的功绩，恐怕还是编纂《康熙字典》一事。因此，中华字典博物馆便落户在了陈廷敬故居皇城相府的至高点——树德院内。

来到树德院的第一进院落，走进“字说厅”，怪哉，每位参观者都低头沉思着。原来，这里的地面上刻满了古体文字，有陶文、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不一而足。“字说厅”所展示的正是汉字与字典形式的变迁。环顾厅内三面墙上，悬挂着包括《说文解字》、《尔雅》、《康熙字典》等古今最具代表性字典的版样。

字典古称字书，萌芽于先秦，奠基在两汉。《说文解字》堪称我国第一部字典，《尔雅》则开词典之先河。此外，西汉的《方言》、东汉的《释名》分别是我国方言词典、音训词典的滥觞。而《康熙字典》则是中国第一部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字典，它集中国古代字书之大成，又为现代字典奠基，对中国辞书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为学人所引用。

中华字典博物馆：

在小山沟里

“说文解字”

□ 李哲

说到这里，大家总想能够一睹实物。事实上，作为国内首家字典博物馆，这里不乏古代字书中的精品：明代木刻版的《说文解字》、《尔雅翼》、《字汇》(5种)，清代木刻版和石印铅印的《康熙字典》(55种)，还有大量民国时期和共和国初期出版的珍贵字典，如《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新华字典》的初版等等。而在专门收藏外国字典的“异言阁”中，英国牛津、美国韦伯斯特字典家族100年前的各种出版物也尽入其中。据统计，中华字典博物馆有历代各种版本的海内外藏品，各种版本的古代字书，以及近代和现当代字典、辞典3000多种，共计2.1万余册。

字典博物馆可不仅是个展览厅，这里更像是字典爱好者、收藏者和研究者学习交流的场所。2007年12月13日，中华字典博物馆来了一位特殊的游客，他让导游哑口无言。在陈列“辽夏金元字书发展期”的第三展厅，当导游解释说《突厥语大词典》是用阿拉伯文注释时，这位游客马上纠正：“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突厥语大词典》就是用突厥文编撰而成，突厥文是伊斯兰文化中的一种，不能说成是阿拉伯文编撰的。”原来，这位游客正是文坛大家王蒙。

同年，《康熙字典》学术研讨会在皇城相府召开。会议期间，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副委员长的许嘉璐激动地向博物馆赠送了一批由他亲自主编的字典辞书及一本珍贵的《康熙字典》。在“稽古阁”展厅内，这本纸质已发黄、封二上写有“圣祖御定康熙字典丙辰恭戴葆藏”字样的《康熙字典》，安静地躺在展柜内，散发着历史的韵味。

“字融九域无双侣，典占三千第一春”，站在古色古香的清代院落里，读着这副藏头对联，让人不禁感慨：小山沟有大文化，农民心中藏古今。如果更多的旅游景点都能够向这里学习，开辟类似的文化场所，那么数以亿计的国人则可以在游玩中增长知识、受到熏陶，何其幸哉！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

李丹 梁婧 教蓉

邮箱 jjbzmzk@163.com

七日

很多东西的价值都需要时间来认识，来品味。只有那些耐心穿越时间之河的人，才能够领略其中的真味。

刚刚过去的黄家驹20周年忌日，勾起了不少歌迷的感怀。在英年早逝之后，家驹像张国荣一样被人念念不忘。可细看下来，纪念家驹的声势要小得多了，也许因为他更多的是一个歌手，而不是娱乐明星吧。

品味家驹的难得需要时间。和“70后”很早就以家驹为偶像不同，作为一个“80后”，笔者对Beyond的感觉从一开始就与怀旧相连，而那吟唱的深意，也非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所能深懂的。记得当年曾听一美女同窗盛赞，家驹这样的才是真男人，心中颇不以为然：能唱歌的多了去了，这个不说国语、

领略真味需要时间

□ 章木扬

小眼睛、瘦弱的歌手凭啥能当得起此等赞誉。10多年后，再听到音响里传来的他那那充满力度的声音，回味那些至今传唱的老歌，不禁慨叹当时的青涩。而如今再看10多年前姹紫嫣红的芸芸众星，早已无可奈何花落去，大部分连一首值得重温的歌都没留下。

现如今，两岸唱片业皆日渐消沉，几无新歌可听，让人愈发觉得家驹的可贵。他为Beyond写出的100余首歌，有不少都堪称经典。从“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无论何时响起，都足以拨动心弦。而在他生前的那个年代，统治香港乐坛的是娱乐工业的生产方式，四处蔓延的是浅吟低唱的男女情愫，大红大紫的是相貌俊美的偶像明星。在那样的环境里，黄家驹对音乐和思考的坚持，以及Beyond歌声中对自由、道德、理想的追求，都被衬托得出奇另类与稀有。香港音乐衰落之后，大陆流行音乐曾有过一段热闹，可好歌也越来越少，

最终到了“非选秀不唱歌”的地步。而新晋歌手们热衷于各种与音乐无关的热门节目，不惜在镜头前出乖露丑搏出位，这也是家驹当年所深恶的。

不仅是音乐，很多东西的价值都需要时间来认识，来品味。最近这些年，在商业力量的推动下，曾出现过几轮“国学热”。一些所谓的“大师”，以国学的名义四处讲学、办班，频繁出新书、接访谈，看起来颇为热闹，却罕有真正学术意义的著作、观点，国学的真正价值也在这一轮轮的热潮中“隐身”。6月23日，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说，“国学热”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有一种最可怕，就是一种热潮一旦出现，马上就会变成生意，很多讲国学的人是带着一种传销的热情讲的，虚热只会更让我们头脑发昏。

而在这股风潮的热度未及之地，却有人在默默地探索学问的奥义。比如最近在高考中写出古雅骈体文的江苏农家子弟王云

飞。一位专家如此评价他的作文：这位考生写的是纯正的文言文，有思想，体现出很深的修养，直接读古文献的硕士都没问题。王云飞的国学底子全来自于爱好，他曾把一部《资治通鉴》翻烂，这是如今很多中文系的研究生都做不来的扎实的功课。再比如前些日子不幸去世的社科院副研究员张晖，也是从10多岁就开始潜心研究古代文学，多年的精勤功夫之后，终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了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张晖生前曾说，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不少难得的东西，在纷繁喧嚣的环境中，反而容易淹没在一片嘈杂之中。惟有经过时间之河的磨洗，待周围逐渐归于沉寂，才能慢慢展露出华美的光芒。也只有那些耐心穿越时间之河的人，才能够领略其中的真味吧。